

## 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实<sup>\*</sup>

陈 玉 兰

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因“逆党黄畹案”获罪南遁，<sup>①</sup>是影响其一生的关捩所在。王韬究竟是否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是近代史研究中长期未获彻底破解的悬案，也是王韬生平思想研究、诗文作品解读中最让人困惑的问题。由于王韬本人的矢口否认和多方辩解，友朋同道的同情和维护，<sup>②</sup>执政官员的欣赏和优容，<sup>③</sup>以及清廷最终对王韬不具文的宽宥赦免，在王韬生前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尽管对此案有所然疑，但总体上避而不究，甚至连受皇命缉拿王韬的曾国藩、李鸿章，最终也因欣赏其才华而欲招至幕下。此案在当时震惊中外，于太平天国史、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意义重大，故学界近百年来论争纷纭，不仅在20世纪30、80年代掀起过两次论争高潮，且至今争论不断。总体而言，由于谢兴尧、罗尔纲、胡适等一致持较肯定的态度，<sup>④</sup>而否定论者又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进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清维新变法先驱王韬著作整理与研究”（16ZDA182）阶段性成果。

- ① 《清穆宗实录》卷23同治元年（1862）三月下己酉《上谕》曰：“逆党黄畹为贼画策……计殊凶狡……著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清实录》第4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28—629页）黄畹被指为王瀚（即王韬）化名，王韬因此在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等的交涉和帮助下逃往香港，并一度流亡海外，长达23年。
- ② 比如王韬门生邹弢《三借庐笔谈》卷10《天南遁叟》称王韬“才大学博，倜傥有奇气。发匪之乱，以过激忤当道，遁迹香江”（《笔记小说大观》第26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393页）。
- ③ 王韬《弢园老民自传》称：“当事颇有知其冤者，或贻书劝其出山，或欲托人招致幕下，老民俱谢不往。”（《王韬诗集》，陈玉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附录一”，第371页）
- ④ 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考》，《国学季刊》1934年第1期）、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国学季刊》1934年第2期）、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3号）皆认为黄畹即王韬。

行反驳，<sup>①</sup>故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一事，虽难下十分肯定之断语”，“但上书的可能性极大”，若要彻底结案，“尚待有更新、更多的史料印证”。<sup>②</sup>

此事之所以“难下十分肯定之断语”，主要是一些关键论据不足以服人。其一，就笔迹而言，胡适取王韬同期日记与《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大人禀》（以下简称“《黄畹禀》”）比较，认定二者笔迹相似，系同出一人；否定论者则认为王韬多用行草，不用《黄畹禀》那样工整的楷体。<sup>③</sup>其二，就署名而言，《黄畹禀》钤有“苏福省黄畹兰卿印”，王韬日记中也曾用“兰君”之号，故胡适由《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逆推，认为王韬曾名“畹”，甚至推测王韬新阳学籍中姓名为王畹，字兰卿。然经胡适所托，顾廷龙查实王韬新阳学籍名利宾，字兰卿。胡适只猜对了一半，顾廷龙也说“惜尚无见其署‘王畹’之名以一证耳”。<sup>④</sup>故王韬原名王畹，并无证据。其三，谢兴尧认为《黄畹禀》与王韬日记、尺牋“语气文句，绝相类似”，但吴申元认为所举文句有“牵强比附之嫌”，“经不起推敲”。<sup>⑤</sup>其四，否定论者最主要的依据是王韬在《与醒逋》一函中的自辩，而肯定论者认为《与醒逋》不见于《蘅花馆日记》，因此断定此函系王韬为了给自己辩诬而在1876年《弢园尺牋》付刊前伪造。<sup>⑥</sup>笔者近年在整理王韬文献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可为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一事的结案提供“更新、更多的史料印证”。

① 吴静山（《王韬事迹考略》，上海通社编辑：《民国丛书》第4编第80册《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671—691页）、吴申元（《王韬非黄畹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杨其民（《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兼与罗尔纲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认为王韬上书说证据不足。而王开玺（《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兼与杨其民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李景光（《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兼与杨其民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又对否定论提出商榷。

② 张海林：《王韬评传附容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5页。

③ 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3号。杨其民认为王韬“字迹常带金石气，粗服乱头，自有韵致，很难见到黄畹书那样恭正的小楷。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蘅花馆日记》三册，时间也在咸丰末年，其笔迹与黄畹书绝然不同”（《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兼与罗尔纲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④ 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国学季刊》1934年第2期。

⑤ 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考》，《国学季刊》1934年第1期，第41页；吴申元：《王韬非黄畹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70页。

⑥ 李景光：《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兼与杨其民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第188页。

## 一、王韬早年对“畹”字情有独钟

王韬长女名婉，<sup>①</sup>王韬若本名畹，再给女儿起个与自己同音的名字，一般来说是不合情理的。当然，王韬化名黄畹就另当别论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蘅华馆杂录》中收录了两份《蘅花馆印谱》，其中有王韬56枚私人印章及说明文字，包括眉珠小盒、华曼居士印、蘅华溪馆、王氏利宾、兰卿、王利宾印、王子九印、忤痴盒主、蘅华馆主、兰卿手笔、兰卿诗古文词之印等，但并无“王畹”印。<sup>②</sup>王韬早年的《茗芻寮日志》《蘅花馆日记》稿本卷首，往往钤有“兰卿”印。在《蘅花馆日记》稿本中，王韬自谓“余字兰仙，号子九，正篆崇光”，并附列各种书斋名，如梦燕草堂、秋畹庐、茗香寮、华曼精舍、蘅香山馆、玉魮生楼、绿筠轩等。<sup>③</sup>其中“秋畹庐”值得关注，“秋畹”吴音与“九畹”近。王韬室名并非唯有“秋畹庐”，另有“畹香仙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王韬早年诗集原稿本，名《畹香仙馆遣愁编诗集》，<sup>④</sup>卷端署“甫里王利宾著”，钤“王氏利宾”、“兰卿”印。据第1卷卷首自题“是卷共百首，为丁未年（1847年——引者注）作”，可知其为王韬19岁时作品；其妻兄杨引传亦有题词，末署“己酉元宵前一日弟杨引传盥手读并题”，即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入职墨海书馆前不久。因此，王韬本名利宾无疑，但他对“畹”字情有独钟。考王韬于道光二十六年奉父母之命成婚，不得已辜负了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惆怅之下草撰了一篇小说，系未完稿。直到咸丰五年，王韬续成之。小说主人公名蕙纫，别号小畹。<sup>⑤</sup>“蕙”为似兰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纫秋兰以为佩”之句，正是此名号之出典。而王韬号“兰卿”，寄寓

① 王韬在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述及自曾祖以下家族成员，其中自谓有“女二，一名婉，字茗仙，适湖州府归安县增广生员钱名征字听伯。一名嫫，字樨仙，尚幼”（《王韬日记新编》，田晓春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82页）。

② 刘铮云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史部，第8册，第267—338页。

③ 王韬：《蘅花馆日记》，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册，第3页。

④ 文献编号A848033。

⑤ 王韬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日记：“余于丙午冬曾作一书未成，今当宵长漏永，展帙视之，振触旧怀，聊复忍痛濡墨以续成之。”小说对主人公介绍为：“江浙为名胜区，山水甲天下，中多隐君子……太史蕙纫卜居于此……其子芳，名诸生……芳子名纫，别号小畹，少即颖慧，及长，负才不羁，尝曰：‘区区之富贵功名，乃为学业累乎？为儒生者，显则铭勋金石，功震当时；隐则托迹林泉，名传后世，是亦可耳。’”（《王韬日记新编》，第142页）考王韬祖名科进，父名昌桂，自号兰卿，与小说人物蕙、芳、纫暗合。

了此小说的自传性质。《畹香仙馆遣愁编诗集》代表王韬生命轨迹和思想历程的逻辑起点，但是在王韬后来的著述，以及他自己整理的著述目录中，都不曾出现这个早年诗集的名称，此诗集中仅十数首诗歌，被收进他自编自刊的《蘅花馆诗录》；并且连这幸而入选的十数首诗，也已被删改，迥非原貌。除了讳其少作外，当也有惹祸后忌讳“畹”字的原因。事实上，自上书事件后，在目前所见王韬日记和尺牘中，除称呼黄梦畹、周畹秋、任畹香之类的他人名号外，王韬再也不曾用过“畹”字。<sup>①</sup>

以上证明，虽然以《离骚》诗句逆推黄畹即王韬确为正解，但并非胡适、罗尔纲所认为的那样，王韬在家乡的时候就叫王畹，只是因为上书太平天国事发才隐讳其名。<sup>②</sup>王韬本名利宾，字仲蘅，号兰卿，之所以用“黄畹”之名上书，第一是因为太平天国避天王讳不得用“王”字，且吴地“黄”、“王”音近不分，常被混用；<sup>③</sup>第二是因为王韬往往在人生转折关头改名，正如寄身墨海书馆后改名王瀚，南遁香港潜影匿迹后改名王韬。因而极有可能的是，王韬在咸丰十年五月随艾约瑟等到苏州刺探军情，在会见忠王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官员时，<sup>④</sup>因有所顾虑而讳用本名，于是用了他少小即钟情的“畹”字，化名黄畹。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在王韬上书事发遭通缉时，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为王韬开脱，在其发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中，只就王瀚上书的用意展开辩护，并未质疑黄畹是否为王韬。<sup>⑤</sup>另据《黄畹稟》，王韬与刘肇钧本系旧识，王韬曾经“趋谒”，刘氏亦曾为之“推毂”，此番若向熟

① 据《王韬日记新编》、《弢园尺牘新编》（陈玉兰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统计。

② 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3号；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国学季刊》1934年第2期。

③ 《申报》1872年10月4日第3—4版刊有王韬《续录普法战纪》，误署为“吴郡黄韬紫詮削订”，系“王”、“黄”音近致讹。

④ 《蘅花馆日记》稿本缺咸丰十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七日日记，这几日间，艾约瑟、杨雅涵前往苏州，会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王韬五月十八日记“至家，知老母以下皆无恙。友朋来访，新异者踵至……询以游吴诸异闻”；二十日记“暮访魏盘仲彦，与之话贼中情事”；二十五日记“将游吴目击情形，拟作方略十条，冀当事者万一之采也”；六月十三日记“艾君以伪干王洪仁玕有书来招，欲复至吴门，坚邀余去，余固辞不往，托疾以辞之……且顾名思义，断不可重往者也”（《王韬日记新编》，第473—475、479页）。可见王韬对随行苏州之事心态复杂，顾虑重重。

⑤ 英驻华公使卜鲁斯有《英领差卜鲁斯为沪英领未旨交出黄畹缘由照会》（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英钦差卜鲁斯为查拿黄畹不便助办照会》（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一日）为王瀚（韬）辩护，其中卜鲁斯曰：“本大臣之见，果是王瀚亲撰之文，显系恐贼疑有异心，本人及家眷难免被害，故假为此与贼同心之论，令贼改图不进攻沪。”没有对黄畹即王瀚提出质疑。两份照会参见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20辑《太平天国史料（清廷诱捕黄畹事）》，1934年，第43—47、48—50页。



人上书而临时化名，是不合情理的，只能说是“将错就错”而已。但又怕日后事成有人“混冒影射”，所以又刻一印章以作征验。在特定背景下，王韬化名“黄畹”，而仍用“兰卿”之号，在似是而非之间，可进可退，体现了其政治投机心理。

## 二、《黄畹稟》“附注”为王韬手迹

王韬用笔并不都是率意的行草。笔者发现，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增田涉文库藏有王韬《蘅花馆尺牍》稿钞本，<sup>①</sup>纯用楷体，其中有几函为王韬亲笔手书，与《黄畹稟》末页附注24字笔迹一致。

《蘅花馆尺牍》稿钞本为《弢园尺牍》刊印时所据底本之一，从此稿钞本的命名看，应是王韬早期尺牍汇编。此题名与王韬初恋之名菊华、号蘅阁内史的“某女士”有关。“某女士”因王韬另娶而郁郁早逝，王韬给发妻取号梦蘅，给续弦取号怀蘅，自号蘅花、蘅花馆主，皆寓追念悼惜之意。

《蘅花馆尺牍》是根据王韬尺牍备份稿过录的誊清稿钞本，并在付印前作过较多修订，总3卷，末另有未编卷的尺牍3函。卷首钤有“增田涉文库”印，版心印“弢园述撰”，鱼尾处印“天南遁窟精钞”、“吴郡王韬存本”。卷1凡60函，署名“长洲王韬仲弢甫”；卷2凡25函，未署名；卷3，有尺牍9函。原署“吴郡王韬紫诠”又抹去。作者对署“王韬”之名尚有犹疑，主要是因为该稿钞本所录都是他南遁前的尺牍，而“韬”是逃亡香港以后改的名字。稿钞本卷3最后两函，一是《与龚孝拱》，撰于1860年杭城失守、“感愤怫郁”之际，内容多言志抒怀；二是《与醒逋》，撰于南遁前夕，“闭置一室之中一百三十五日”之时，为己鸣冤并托付后事，此函由王韬亲笔抄录，并有后来又加润色的痕迹。此后有数行空白，意味着王韬人生的转折。空白后是《与方观察》《与懒云上人》《与黄捷三副将》3函，都道及游穗垣（广州）之事。而王韬游穗在1873年，与前一函《与醒逋》写作时间有十余年之隔，当是因为此稿钞本尚有不少空白页可用，因而又着抄胥抄录，故此3函仅笼统题《蘅花馆尺牍》，未标卷次，亦未署名，其后仍有空白页可备再抄。由此可以判断，该誊清稿钞本前3卷抄纂的时间大约在王韬南遁（1862）后不久，在1873年游穗后加抄3函，统加校订。如此，此稿钞本中王韬亲笔所书楷体尺牍，与《黄畹稟》写作时间接近。由此亦可见，前述对王韬上书事件持否定论者，所谓《与醒逋》一函是王韬为自己辩诬而在1876年《弢园尺牍》付印前伪造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蘅花馆尺牍》稿钞本共97函，是《弢园尺牍》初刊8卷本总128函之主体，虽分卷情况与刊本有较大出入，编次先后也与刊本完全不成对应关系，却是刊本

<sup>①</sup> 文献编号20082830。

的重要底本。函稿内容真实可靠，仅举一例：该稿钞本所收写于不同阶段的尺牍，但凡对受信人自称本名时，从前往后，用了三个不同的名字——宾、瀚、韬。如第19函《呈严馥涛中翰师》，行文中有五处用到撰主本名时，原底稿皆用“宾”；第43函《与杨莘圃（读足下手毕感甚）》有“宾之所学，不过经史诸子”，“残编断简，宾且未能遍阅”等句。以上两函分别撰于1845、1848年王韬在家乡坐馆为塾师时。再如第50函《与杨三醒逋（别来二月）》，有“红蓼花开，碧梧叶落，瀚如不归，足下可来”；第60函《与钱莲溪茂才（一昨江楼对酌）》，有“瀚悼亡新赋，玉骨未寒，何忍遽言此哉！”第62函《寄曹醴卿上舍（小桃开后）》，有“瀚也幽恨茫茫，百端交集”。三函分别撰于1850年、1852年、1852年佣书墨海书馆时，皆自称“瀚”。撰于1873年的第97函《与黄捷三副将（薄游穗石）》则自称“韬”，如“韬亦非与之有一面之雅”，“韬前日所拟上冯子立都转书”等。这些自称变化符合王韬的履历，也与王韬稿本日记中自称的变化一致。以此可知，稿钞本源自手稿原本，而罗尔纲推测王韬少年时期“尺牍的原来署名或许就是那个闯了大祸的‘畹’字”，<sup>①</sup>是没有依据的。当然，凡手稿原本中称“宾”、“瀚”之处，在此稿钞本中皆由王韬亲笔涂改为“韬”，与刊本同，这是付刊前统一体例的结果。

《蕲花馆尺牍》稿钞本从头到尾小楷端整，点画不苟，但明显出自两人之手。其中93函字体瘦劲工整，当出自抄胥之手；另有4函《与赵上舍（寒斋小别）》《与江弢叔茂才（昨承枉顾）》《与友人（往者不佞偕友人登马鞍山）》《与醒逋》分插于各函之间，字体较肥润敦厚，与全稿部分标题字体及点串涂改文字一致，当由王韬亲手抄录。王韬手稿多用行书、草书，但此誊清稿钞本是付刊底本，偶尔手书几函，为求全稿风格一致，同时也为便于排印时辨认文字，故用了较为工整的楷书。细辨1934年《故宫周刊》第363—370期影印发布的《黄畹稟》也有两种笔迹。其中函末“惟恐混冒影射，故暂刻图记，以杜弊端。未识可用否？伏乞训示”一句当系封缄之际加的附注，笔迹与正文截然不同。<sup>②</sup>笔者以此附注24字为准，另取《黄畹稟》正文及《蕲花馆尺牍》内4函王韬手书稿中相同的或具有相同部件的字加以比较，结论是：就笔画形态、结体构架与整体字势而言，《黄畹稟》附注文字与尺牍中王韬手书笔迹一致，也即3000余字的《黄畹稟》，真正由王韬手书的仅24字而已。这证明当年罗尔纲、胡适通过将《黄畹稟》与王韬行书日记文字比较得出的两者笔迹一致的结论，当属误察，对此杨其民等早已提出质疑，只是没有证据。但有了这24个字，就足以证明王韬与《黄畹稟》脱不了干系。王韬曾屡屡上书地方官员，其字迹为人熟悉，

① 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国学季刊》1934年第2期。

② 具体参见前文杨其民所述内容。

他上书太平天国既然不用本名，那么让人代书代抄才是合乎情理的。雇用抄胥于王韬是常有的事，比如王韬有致谢家福函曰：“弟缘是酬应宾客，旋被二竖所侵，几经危殆，幸邀福庇，获有转机。届兹已两旬矣，犹不能握管，特倩友人代笔，略缀数语，以申谢悃。”<sup>①</sup>王韬也经常替人捉刀，如《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代上丁雨生观察书》《代上当轴书》等。《黄畹稟》开头即曰“抱病匝月”，并在末尾留下一行不起眼的亲笔文字，正暗示了代书和托名，为万一事成后验明正身埋下伏笔。

### 三、《黄畹稟》文本与王韬手稿《追录昔年与左孟星书》绝似

上海图书馆还藏有王韬草书手稿本《寄生山馆随笔》，其中的《追录昔年与左孟星书》（以下简称“《与左孟星书》”）与《黄畹稟》“语气文句，绝相类似”，甚至若掐头去尾，中间文字几乎相同。<sup>②</sup>兹加考索，以明此函之真伪、两函之关系、“追录”之原委等问题。

《寄生山馆随笔》内容丛杂，笔记中间杂有几篇诗集序、尺牍文。卷首为《题陈喆甫》七言长诗一首，系未完稿。该诗亦见于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弢园诗词》中，题作《题陈喆甫参赞东海泛槎图》，首尾更为完整。两者文字有较大差异，后者当系对前者的续写、润色，其中另有小注曰“去年十月余年六十，君寄日人古画三幅为寿”，说明该诗作于1888年王韬61岁时。此诗既冠于《寄生山馆随笔》卷首，说明该稿本最早始撰于此时。《题陈哲甫》诗后隔一页又有此诗草稿，草书潦乱、涂乙颇甚，难以卒读；续接一页有一些人名及字号、籍里，然后是首行题为《寄生山馆笔记》的杂纂正文，未见作者名及藏书章。此稿用王韬自制专用纸，版心题《弢园述撰》，鱼尾下印“天南遁叟精钞”、“吴郡王韬存本”，用每页12行蓝格纸，与南京图书馆藏《弢园文录》稿本<sup>③</sup>用纸相同。从该稿本内容、笔迹、用纸来看，当为王韬手稿，然向来未被研究者关注。

《与左孟星书》置于《致傅兰雅》之后、《致黎莼斋星使书》之前。《致傅兰雅》亦见于1889年刊行的《弢园尺牍续钞》卷6，题为《与英国傅兰雅学士》，<sup>④</sup>文字多有不同，刊本多有润色，刊本于篇末有该函写作的时间信息，为稿本所无。其中曰，“山左之行，病尚未能，姑待徐丞先发，黄花开后，当着祖生之鞭。夏首春余，薄寒

① 《王韬致谢家福函稿》之二二，《弢园尺牍新编》，第672页。

② 王韬：《寄生山馆随笔》，上海图书馆藏，文献编号T52501—02；《追录昔年与左孟星书》《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大人稟》，《弢园尺牍新编》，第541—551页。

③ 文献编号1116。

④ 王韬：《与英国傅兰雅学士》，《弢园尺牍新编》，第426—428页。

犹劲”。考王韬山左之行在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朔至年底，<sup>①</sup> 此函抄录时间应在当年春末夏初。而紧挨其后的《与左孟星书》的“追录”时间自然在此之后。《致黎莼斋星使书》曰：“日人岸田吟香回国，托带拙著十数种，亮登记室，检入典签。以日久未奉环云，良深悬系。”<sup>②</sup> 考王韬于光绪十五年七月撰有《弢园醴资刻书启》，谓“今拟设立弢园书局，醴资刊印”，<sup>③</sup> 该年他在友人资助下，印行了所著《春秋经学三种》《弢园尺牘续钞》《重订法国志略》等，岸田吟香回国之际托带的著作当是此类。又考派驻日本的黎庶昌于光绪十六年底任满，《致黎莼斋星使书》当撰于黎氏归国之前。如此，《与左孟星书》的“追录”当在1889年前后。

《与左孟星书》与《黄畹稟》无论结构、语气、句段都高度相似。兹举开头部分段落比对如下：

《与左孟星书》	《黄畹稟》
抱病匝月，笔墨疏懒，久未奉尺一之书，奉讯起居，私衷负疚，罪何可言。	敬稟者，畹抱病匝月，疏于趋谒，眷怀负疚，罪何可言！
前日文旆道经皖省，知上谒曾帅，面陈方略。兄当作一书，削楮未上。	
曾帅经济宏深，气量恢廓，临大利害而不惊，无日不以兢惕持躬，必可上副宸廑，下济穷黎。□虽伏处末第，然无一日不思灭贼之策，伏枕筹维，急图报效。	窃以畹承大人推毂以来，无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尚副厚望，下济穷黎为念。伏枕筹思，急于报效。

① 王韬的山东之行向来因文献阙如而少有研究者关注。笔者获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王韬杂著》稿本（文献编号15622）中有《弢园日记》两册，其第2册自第3页开始记王韬应山东巡抚张曜之招北上山东之始末，其中有曰，“光绪十有四年岁次戊子秋八月朔日……决计作山左之行。九月朔日，已定海晏轮船，北去烟台”。“九月二十二日。进抚署，上谒中丞”。“十有一月朔日……请于中丞，拟早日束装就道”。“九日。早上束装就道，同行为张幼亦太守、邹翰飞茂才”。“二十五日……抵镇江”（另参见《王韬日记新编》，第683、685、686、704页）。另外，日记附有王韬在“明岁犬马之齿六十有二”之际所撰《上镇浙将军长善书》，其中亦有“得山左张中丞书，屡促登程，九月朔日，摒挡就道……（十一月）九日回轅……三阅月行五千里，亦足豪矣！”（另参见《弢园尺牘新编》，第510—512页），与日记所记相符。而关于王韬山东之行的年月，张志春《王韬年谱》系之于1889年秋，谓“王韬去年计划中的山东之行，因病所阻，一直到今年七月初才终于成行”，明显有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77—178页）。因为《申报》1889年1月24日第1版刊有《将星遽陨》曰：“浙江将军长乐初军宪……本月十八日未刻忽患痰逆，竟致骑箕。”王韬只能在长善去世前向其述及自己的山左之行。

② 王韬：《致黎莼斋星使书》，《弢园尺牘新编》，第675页。

③ 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第178页。



续表

《与左孟星书》	《黄畹稟》
前日闻我兵克复安庆省垣，额手欢庆，以为自此则我之上下游可通，而贼之左右臂断矣。贼长江之险已失其所恃，再能赁西人轮船往来其间，绝其接济，贼之亡可计日而待也，此我兵、贼势之一转机也。然安省自迭遭兵燹之后，民力凋敝，元气大伤，尤赖保养生息，抚字殷勤，惟为上者加之意耳。	迺闻天兵克杭，额手欢庆，以为自此襟苏带浙，力争中原，划江之势成矣。然两省自遭兵燹之后，民力凋敝，元气已伤，尤赖十年休养，十年生息，殷勤抚字，惟为尚者加之意耳。
兄之老母山妻俱在沪上，有劝兄以沪上必不可居，须急为迁徙计者，或渡海而北，崇明虽□为一邑而孤悬海中，贼匪无舟，力不能至；或处九峰之乡间，地僻村深，贼踪之所不及反乃安。	今畹之老母山妻、弱息稚胤，尽已迁徙至里。从兹托庇宇下，实望栽培而嘘噢之。
沪上风景虽未甚决裂，而民情惶惧，有刻无可安之势。	沪中风景虽未甚决裂，而民情惶惧，有刻无可安之势。
我兵驻守城垣者，仅有八千，皆系仓卒招募，素未习练行陈，所恃者洋人耳。洋人以贼兵或来，有碍通商大局，有必战之志，无议款之说。	菁兵驻守在城者，仅有八千，皆系仓猝招募，素未习练。行阵所恃者，洋人耳。洋人以天兵之至，阻碍通商大局，有必战之志，无议和之说。

以上所举尚属差异较多的文字，然而即便如此，两函之相似已可见一斑。若《与左孟星书》确属王韬当年所撰，则《黄畹稟》纵非皆王韬亲笔所书，其内容确为王韬所撰。《与左孟星书》与《黄畹稟》如同一场战事中站在争战双方不同立场上针锋相对的言说。《与左孟星书》称，“贼若犯洋人，则我之所深幸也”，劝官兵取和戎策，力居上游，迫使太平军攻打上海，洋人受挫或通商利益重损，自会反攻，这样可以让太平军与洋人互相消耗，官军则顺流进取，坐收渔翁之利。《黄畹稟》反其道而行之，游说太平天国勿犯洋人，暂缓图上海，用兵上游，继战中原，高瞻远瞩，则“大者远者既得，而小者近者自克举矣”，取上海水到渠成。

那么在20余年后“追录”的《与左孟星书》是否可能作伪呢？笔者认为，《黄畹稟》是缉获后立刻上呈朝廷的军事密件，一般人无从得见。<sup>①</sup> 最早在笔记中述及此事并披露《黄畹稟》内容的，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其元于同治十二年在

① 同治元年三月六日此函为“夷兵攻贼营所获”，由吴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于三月十五日将此函呈曾国藩，由曾国藩上奏朝廷。参见李鸿章：《上曾相》，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9册，第76—77页。

《庸闲斋笔记》中的追忆。陈其元虽曾在江苏巡抚薛焕处见过《黄畹稟》，但时隔12年，“洋洋数千言，今则不能记忆矣”，<sup>①</sup> 仅以300余字概括，且已有误记。若《黄畹稟》不出自王韬之手，事发后其“闭置一室”中避祸，继而亡命天涯23年，最多也只能听闻大概，并无机会寓目，要在20余年后“追录”一封与未曾寓目的《黄畹稟》极相似的《与左孟星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上文从字迹确认王韬与《黄畹稟》难脱干系的前提下，《与左孟星书》的写作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王韬当年的确写过这信函，并且或习惯性地留有备份，<sup>②</sup> 或由于某种原因此函未能寄出（就像《拟上曾制军书》欲上未上一样），多年后据底稿或原稿追录。从《与左孟星书》稿本首尾基本一气呵成、涂乙痕迹无多来看，其“追录”是有依据的，不然不大可能有那么高的相似度。二是仿《黄畹稟》而伪造，以证明《黄畹稟》系他人栽赃嫁祸。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其一是因为王韬以《黄畹稟》惹祸，在朝廷追缉关头不敢留下底稿以供日后仿写；其二是王韬若真想借此为自己洗白，早该反诬受信人左枢（字孟星，又作孟辛），但两人死生相契，栽赃与反诬始终不曾发生在他们之间。

左枢多次出现在曾国藩、郭嵩焘、赵烈文等人日记、年谱中，王韬日记、笔记中也多有记载。其《瀛壖杂志》“左孟辛”条曰：

左孟辛，名枢……乱后挈家避兵沪上，与余往还最密。载酒看花，剪灯话雨，殆无日不相见也。孟辛才气纵横，好谈经济，年仅二十余，而诗文浩瀚卓厉，不可一世，洵天下才也。

同书“汪燕山”条曰：

湘乡左孟辛、邵阳魏盘仲、阳湖赵惠甫，皆意气激昂，高自期许，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每当酒酣耳热，击剑谈兵，精悍之色，现于眉间，惜以时无用之者，咸郁郁不得志。此两年中，几于无日不相见，见必轰饮达旦。孟辛酒胆轮囷，气益豪迈，举世无足以当其一盼者。<sup>③</sup>

在王韬眼里，左枢是一个才气纵横、意气豪迈、睥睨天下的人物。他首次出现在王韬日记中是在咸丰十年三月初七：“薄暮，往访龚孝拱（龚自珍子——引者注）不值，晤其戚左孟星，才从湖南来，捐纳同知，分发粤东。谈吐雅驯，容止文秀，亦翩翩佳公子也。”<sup>④</sup> 此后两人深相交契，“几于无日不相见”。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

①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2《王畹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7页。

② 王韬生前曾自刊《弢园尺牍》及《续钞》凡18卷，未收入刊本中的尺牍稿数量颇多，仅《弢园鸿鱼谱》手稿本就有65函，说明其所撰尺牍一般都留有备份。

③ 王韬：《瀛壖杂志》卷5，“左孟辛”条、“汪燕山”条，沈恒春、杨其民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9、88页。

④ 《王韬日记新编》，第436页。

王韬有感于“神州陆沉，苍生涂炭”，为“一览贼情”，次日随艾约瑟、伟礼逊、佛礼赐等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王韬此行虽以宣教名义，实则参与了英国与太平天国的谈判。作为一位儒士，随洋人参与这样的活动是犯忌的，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前来送别的只有左枢、魏彦（魏源之侄），可见相互之信任与理解。同年六月，据《赵惠甫年谱》，王韬与赵烈文、童椿、汪汝桂、左枢、左树、魏彦、汤裕诸人在上海互易庚帖，结为兄弟。

左枢于咸丰十一年初冬，乘轮船至汉口，由水道回湘南。离别之际，王韬与之互相赠答。从往还诗文来看，两人互托乱世知己，惺惺相惜，可谓情深意厚。王韬对左枢以将才相期许，而以陈书贾谊自哀。左枢返湘乡，先往见曾国藩，后至粤中赴任，最终从戎陕甘，大约在1869年卒于军营。<sup>①</sup>

左枢在沪期间，王韬与他及其戚属龚孝拱时相过从，慷慨言志、纵横论兵是相聚之日常。左枢离沪后，王韬“抱病匝月，笔墨疏懒，久未奉尺一之书，奉讯起居，私衷负疚”，因而写下此函，时间当在咸丰十一年仲冬。王韬此时有《拟上曾制军书》，然“削楮未上”，未上的原因不得而知，但王韬在其中对官兵多有指责，谓“贼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是岂贼之能兵哉，皆我备御之无方耳！”<sup>②</sup>他深知直言切谏只会刺激曾国藩而招来忌恨，正像以往他向地方当政者如薛焕、徐有壬、吴煦等屡屡上书献策，却每每碰壁一样。而左枢出身名门，经已在曾国藩东流行营的赵烈文推荐，<sup>③</sup>新得曾国藩赏识，<sup>④</sup>通过左枢向曾国藩传递自己的御贼策略，更有希望获得重视。王韬赠左枢诗句，如“报国廉颇老，陈书贾谊哀”，“遭乱离忧百事灰，生平怀抱几时开？”“万言羞学纵横术，四海谁知经济才”，“湘云吴树参差里，珍重江干报札来”，等等，明显是自谦与自信兼具、失意与希冀同在，他期待着能有与几位结拜兄弟一样的际遇。

《与左孟星书》既然是私信，如确已寄出，由于内容涉及军机，当不会公开传阅，外人无由得览。而《黄畹稟》和《与左孟星书》属同一计策的两个方面，那么王韬为自己辩诬、指斥有人托名伪造时，应该直指左枢嫁祸才最合理，但他没有任何指斥文字，相反在《瀛壖杂志》中称赏“左家昆季俱好事，长者经济尤无敌”，<sup>⑤</sup>

① 参见王韬：《瀛壖杂志》卷5，“左孟辛”条，第89—90页。

② 王韬：《与左孟星书》《拟上曾制军书》，《弢园尺牘新编》，第541、132—135页。

③ 赵烈文推荐了左枢、汪汝桂，没有推荐王韬。曾国藩有“稽查奸细”的警惕、“维持风教”的意识，而王韬屈身事夷的经历及不顾细谨的风操与曾国藩的道德标准有差距。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九日记曰：“同知左枢，湘乡人，英伟俊特，刚决能断，有胆有识，读书通雅，诗文笔皆雄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657页）

⑤ 王韬：《瀛壖杂志》卷5，“汪燕山”条，第89页。

对左枢后人也称赏不置，如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所写《与魏盘仲直刺》曰：“一昨遇罗伯峰从楚中来，自述为孟星女倩，言论恢奇，丰姿飒爽，诚不愧为冰清玉洁。孟星仅有一子，身弱多病，惟兢兢自守，尚能不堕家风。”<sup>①</sup>足见王韬哪怕到了晚年，还对左枢念念不忘。由此亦可见《与左孟星书》并非王韬为自我洗白而反诬故友、有意伪造。《黄畹稟》的结撰是王韬在其历史“循环论”思想、<sup>②</sup>政治投机心态、军情突变形势下保护家人和桑梓意图的体现，<sup>③</sup>以及在误判当时形势等诸多因素作用下，<sup>④</sup>政治立场抉择的结果。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从卫道的正统立场看，上书太平天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故而在事败之后，王韬一直为自己“辩诬”，时而说“疑生投杼”，时而说“嫁名”栽赃，还有“密纵反间”、“侦贼遭谗”等，因人而异，因时不同。<sup>⑤</sup>

既然一直为自己辩诬，为什么时隔多年，王韬又要“追录”一封旧函，从而最终把自己一直想洗刷的“污名”坐实呢？笔者以为，两函针锋相对，不管哪方采纳，都关乎“治乱之大道”，能使“国威复振”、“平治有期”；<sup>⑥</sup>惜乎争战双方都不曾见用，致使金瓯渐缺、民生日蹙，这才是王韬无法言说的真正“冤屈”所在。但凡执政者能以“出类拔萃之士、拨乱应变之才”为辅弼，<sup>⑦</sup>不带偏见，从善如流，采纳他的计谋，那么，近代中国也许会呈现不一样的局面。<sup>⑧</sup>但无论如何，王韬深

① 王韬：《与魏盘仲直刺》，《弢园尺牘新编》，第465页。

② 王韬在日记中称“大劫之后，归于平淡，兵气自此而消，所以历古以来，一治一乱，迭为终始也”，认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就是“草莽崛起，因乱致治”（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这是“盛极则衰，天道有循环”（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日）的循环史观。在王韬看来，能“完已隳之金瓯、扶将衰之敝局”的英雄未必是君子，也可能出自草莽，这是他改投太平天国的一大动因。（《王韬日记新编》，第468、278页）

③ 咸丰十一年二月王韬随洋人至天京，知洋人与太平天国谈判，“说其无加兵于沪，以周百里为界”，天王“悍不之许”（《与左孟星书》）；如今太平天国“诸大臣”谓“无论前日百里之约不能从命；即今日加沪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岂能顾通商大局！”（《黄畹稟》）故上海很快将陷于战火。王韬奉母还乡，听闻了太多战乱带来的人间惨剧。（《弢园尺牘新编》，第542、547页）

④ 王韬咸丰十年四五月间的日记实录太平军“至无不胜，攻无不取”，“至江南，如入无人境”，感叹太平军“虽无纪律，尚谓善兵，贼中或未必无人也”（《王韬日记新编》，第459、469、472页）。

⑤ 王韬：《与醒逋》《与吴子登太史》，《弢园尺牘新编》，第136、142页；《王韬诗集》，“附录一”，第370页。

⑥ 《英领差卜鲁斯为沪英领未旨交出黄畹缘由照会》，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20辑《太平天国史料（清廷诱捕黄畹事）》，第45页。

⑦ 《王韬日记新编》，第314页。

⑧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2《王畹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曰：“其虑甚周，其计甚毒，故在上海者阅之，无不发指，无不失色。”（《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第297页）



知自己本来就是那个黄畹，在一些同时代人的意识深处他也始终是那个“黄畹”，<sup>①</sup>自己再怎么“辩诬”都改变不了事实。而且，随着世易时移，他早已如愿以偿地回到江南，寄居沪上，自可以少些狐死不能首丘的顾虑，在“死生旦暮”的晚年，<sup>②</sup>不妨将当年那场风波明白地载入历史，是非功过，让后人评说。但终究，此函稿没有像排在它前面的《致傅兰雅》那样，经润色后被收入王韬自编自刊的《弢园尺牋续钞》，因为睁眼看过世界的王韬毕竟是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文人，事关名节，他终究还是存了些顾虑。更何况，《弢园尺牋续钞》只收《弢园尺牋》刊刻以后续写的尺牋，“追录”者不在其列。

##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依据一些新发现的材料，证实王韬确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对上书事件，由于王韬在尺牋、诗文中长期不断、连篇累牍地为自己鸣冤叫屈，百般申辩，世人普遍给予同情，认为王韬蒙受了不白之冤。如今这个“世纪之争”最终得以廓清，一来可以让研究者不必继续空耗心力，为王韬作罪名莫须有的辩污，或上书之事实的求证，二来使王韬研究也可以不再受其自我辩白的误导，而对其人其作产生误解和误读。在确认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的前提下，理性客观地把此事件放在近代国内外纷繁错综的政治格局、口岸知识分子进退失据的生存环境背景下，分析以王韬为代表的转型期口岸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古今思想交汇的人生十字路口矛盾复杂的群体心态、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举棋不定的行为方式，才能对王韬庞杂的存世文献作出合乎历史逻辑、时代特征和人性本然的解读，对近代思想文化史，特别是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将有所裨益。

〔作者陈玉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金华 321004〕

（责任编辑：黄娟）

① 如《益报》1875年10月4日《〈循环日报〉与〈华字日报〉论辩》一文道：“昔上海有作日报之王某，吴人也，作通贼书，献策于贼，招发逆来攻上海，为内应，其书为营将所得……其即此作《循环日报》之王某乎？上海之事有案可稽也。”转引自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史事考辨》，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210页。

② 王韬返沪后时有性命之忧，如1888年撰《与许壬瓠主政》有曰：“行年六十有一，多病乘之，恐不久于人世矣。”（《弢园尺牋新编》，第424页）

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labor conflicts, hindered the working class solidarity, and reflected the immaturity of the early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

*Discussion and Review*

**Revisit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First Türk Khaganate Revisited with a Focus on İstāmi** Meng Kaizhuo and Yu Zixuan (165)

The existing mainstay narrative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First Türk Khaganate (before 583 AD)—İstāmi and his descendants controlled its western part while Bumīn and his descendants ruled its eastern part—is based on the material of multilingual fragments erroneously gathered together by É. Chavannes. Sources concern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First Türk Khaganate include three parts: (1) contemporary records; (2) recollections of later Türks; (3) reconstructions by later historians, represented by the chapter of *Western Türks* in the *New Book of Tang*.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se sources tells that İstāmi was not Silzibul/Sizabul/Sinjibū that was activ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First Türk Khaganate, nor the founder of the Western Türk Khaganate who proclaimed himself as a Khagan after conquering the western regions. It is relatively reliable that İstāmi defeated the Rouran Khaganate together with another Khagan, as reflected in Niri's letter (Theophylact's *Exkurs* on the Türk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First Türk Khaganate demonstrates that before 583 AD there was but one Türk Khaganate under the rule of the great Khagan rather than the coexistence of two.

---

*Historical Notes*

**Exploration of Statecraft Based on Historical Practice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u of the Song Dynasty** Chen Feng (188)

**Verification on Wang Tao's Letter Submitted to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Chen Yulan (206)